

静如文存

下卷

张静如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静如文存

张静如 著

下卷



静
如
文
存

张静如
著



◎ 封面设计 / 慈向群

张惠芝
孙雪松

◎ 责任编辑 / 邓子平

目 录

上 卷

自序	张静如	(1)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
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学习毛主席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12)
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		
——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蔑		(23)
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32)
论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思想革命		(50)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65)
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研究中的 一些问题		(73)
李大钊和陈独秀		(86)
浩然正气 耿耿丹心		
——读《李大钊传》		(96)

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水平

- 纪念李大钊同志诞生九十周年 (101)
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11)
刘少奇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贡献 (133)
关于陈独秀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标志和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区工作 (153)
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之史的考察 (174)
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读《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191)
李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197)
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204)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209)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217)
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形成的特点 (231)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46)
刘少奇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形成的贡献
——读《刘少奇选集》上卷 (266)
马克思主义是青年进步的指路明灯 (277)
陈独秀评传 (282)
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几点意见 (324)
邓小平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338)
高等学校党史课程要改变
党史学科仍要继续发展 (355)
李大钊对国共合作的贡献 (372)
再促李大钊研究工作的发展 (384)
李大钊和北京师大 (391)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讲授提纲） (403)
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 (442)

目 录 3

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象	(464)
《“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自序	(470)
写在前面	
——《中国革命史简编》序	(473)
《中国革命史教学必备》序	(477)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	(480)
二十种中国革命史教材的简略比较	(494)
中国革命史体系的若干思考	(504)

下 卷

党史学科建设断想	(511)
学习十三大报告 加强革命史教学	(522)
关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528)
《汪精卫评传》序	(537)
刘少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理论的特色	(545)
致《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主编	(555)
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	(559)
“五四”与青年	(572)
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578)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序	(592)
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没有错	(596)
李大钊论历史学	
——重读《史学要论》	(603)
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	(613)
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	(625)

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的史学思想	
——纪念张闻天诞生九十周年	(638)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	(649)
党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学点党史学史	(662)
《化干戈为玉帛》序	(667)
《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序	(670)
繁荣发展中的党史研究	(674)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	(679)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	(688)
再论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形成的特点	(703)
“七一”感言	(713)
党史研究重点应转向社会主义时期	(717)
✓ 1949 年至 1956 年中国社会的演化、变革与社会	
现代化	(728)
《近代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序	(739)
《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序	(743)
关于“毛泽东思想概论”的若干思考	(746)
✓ 再议社会现代化	(751)
《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序	(758)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760)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	(775)
评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784)
《蒋氏父子在台湾》序	(789)
宏观把握毛泽东	(79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命运》序	(801)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走自己的路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804)
《李大钊研究辞典》序	(818)

《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序	(822)
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	
——纪念新中国成立四十五周年	(825)
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	(831)
共产党员要有现代化意识	(846)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853)
《当代美国的“显学”》序	(868)
《五四民主观念研究》序	(872)
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	(875)
深化党史研究	(890)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序	(895)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报告提纲）	(897)
中共党史学诠释	(904)
邓小平与中华民族复兴	(910)
论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	(921)
《新视野》1997年增刊说明	(933)
《毛泽东研究全书》序	(935)
《中国的内战》中译本序	(936)
与胡华同志一起去山东讲学	(942)
中共十五大与党史学科发展	(947)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阶段的思考	(958)
《李大钊传》序	(972)
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	(975)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	(981)
“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999)
《新生活运动研究》序	(1012)
继承“五四”光荣传统	
全力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	(1015)

6 静如文存

-
- 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概论..... (1025)
 - 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 (1039)
 -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 (1051)

期对学生进行理论和思想教育的需要为根据，选定恰当的学科充任政治理论课。被选入的学科的本来性质，并不因此改变。不认识这一点，自然就会造成对党史学的性质在观念上的误差。这种误差，影响极大。史学界从来不把党史学划在史学的范围之内，它“理所当然”地被挤入法学门的政治学科之下。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其按自身应有的规律发展，也不利于其作为政治理论课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特长为高等学校理论和思想教育服务。这个问题在以往总有点说不清楚，说多了反而产生误解。现在，高等学校已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这对说明党史学的性质，减少了一些麻烦。

说来也简单，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者是分类的，都应归属于历史学科。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科学。

学科性质问题，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前提。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科学，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于避免走上歧路。

自从建立起党史学科，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学的研究有很大成绩，这是必须承认的。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党史学的研究较之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处于落后状态。如党史过程、事件、人物的研究多属低层次，高层次的宏观研究很差；对研究史料及其利用方法的史料学、文献学，重视很不够；党史学一般原理和方法的研究，很少涉及；党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等等。造成落后的原因很多，不可简单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应该说，它同不明确学科性质有直接的关系。

二

党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长期被党史学界忽略的问题。研究对象就是学科研究的客体。由于研究的客体不同，才区分开不同的学科。这一点，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得明明白白。只有弄清楚自己这门学科是干什么的，才能按照正确方向开展研究，否则离题万里，劳而无功。许多学科都注意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此作为研究的起步。可是，党史学界对此则不甚重视，即使偶尔有人提及，也很少引起讨论。数得过来的几篇文章，多只是分析党史学的研究内容，如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而没有提高到对对象做出科学的概括和表述。

关于党史学研究对象，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曾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认为这段话讲得很中肯，对说明什么是党史学研究对象大有帮助。据此，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表述：党史学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要不要把“规律”放在对象的表述之中呢？我看不必。因为“规律”的发现是研究的结果，是研究的目的，而不是对象本身。

党史学的对象决定着党史研究的内容。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但概括说来，不外两个方面，即党自身的发展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这两个方面都要研究，不能偏废。以往，对党自身发展方面的研究，碰到一些麻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把党史归结为路线斗争史，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后青年学生对党自身发展的历史不感兴趣。对

此，我们纠正了把党史仅仅归结为路线斗争史的错误做法，但同时在研究中，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讲课中，尽量减少党自身发展的内容。后者的做法不太合适，是不科学的。削弱这方面，党史就不成为党史了。现在，高等学校已改上中国革命史课，后顾之忧不复存在。这样，党史工作者就应该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发展方面，诸如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党内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发展、党的组织系统的变迁、党的组织原则的发展、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等问题的研究。

我概括的党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一定对，只希望同行们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对象弄清楚了，内容和体系的研究也就有基础了。

三

既然党史学是历史学科，那么它的研究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近些年来，史学界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有不少成果，给人以启发。可是，党史界对此反映却很少，似乎这些研究与党史无关。当然话不能说绝，确有一些同志发表过历史人物评价、史论关系、史料运用问题以及党史学史方面的文章，但数量极少。据我所知，全国约五百个以上的党史研究生，几乎没有人选写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硕士论文。这应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任何学科的研究，都要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否则学科的发展就要受阻。遗憾的是，党史学的研究对此长期不太明确，党史研究工作者缺乏这方面的修养，甚至有人把党史研究的理论同史上有关理论、党史研究方法同理论学科研究方法混为一谈。人们仅仅靠着不自觉地使用史学理论和方法，这必然使党史的研究处于落后于其他史学研究的状态。

诚然，这些年来，党史的研究始终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这也是它能够在正确轨道上发展的根本保证。但是，历史观和史学理论、方法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同史学理论和方法简单地混淆起来，势必造成党史研究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弊病。所以，解决了历史观的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在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掌握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党史学的发展。可见，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方面，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说来，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应该弄清楚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现状，把这些成果运用到党史学的研究中，并从党史学的研究中总结概括出一些原则，丰富和发展已有的成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做出贡献。譬如，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在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解剖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处理，则较之研究古代史更能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作用。再如，这些年来，在党史研究中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充分显示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具有强大生命力，它在今天并没有过时。之所以有人不那么敢于理直气壮地去坚持，实际是由于曾经不正确运用出现偏差而造成观念上的误解，而不是它本身的过错或过时。就拿阶级分析方法来说，其名声一度不好的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不正确运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被滥用。其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从阶级社会有阶级区分的事实出发，强调对人和事的认识要注意阶级关系的一种很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身同对人和事的分析公式化、概念

化、脸谱化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它不是先验的方法，而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它除了要求对不同的群众和个体的言论和行为做具体的经济地位的考察，以明确其阶级属性以外，还要求具体考察各个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集团间的非阶级的共性意向；考察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考察分属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个人意向及其对本阶级、阶层、集团的不同意向，考察各个阶级、阶层、集团或他阶级、阶层、集团的影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生动的、辩证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使用不好，应该怨我们自己，而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它，要努力地坚持它。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有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有个恢复其本来面目 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向前推进发展的问题。

其次，要弄清楚党史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治史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中国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研究历史的方法有许多是不科学的；同时，他们也留下了整理、分析历史资料的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形成以来，传统的治史理论和方法经过改造，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组成部分。虽然这种批判继承工作还很不完善，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但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确实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党史学研究工作者在实践中也常常使用它去整理、分析史料，但在认识上却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因而就不能自觉地通过学习加强这方面的能力，更不能自觉地建立党史文献学、目录学等辅助学科。对于复杂的现代社会条件、复杂的党内外斗争所遗留下来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怎么能够离开考据、辨伪、校勘这类工作呢？怎么能够离开目录、分类、注释这类工作呢？应该说，党史研究中所要做的这类工作，并不比研究古代史、近代史

少。譬如，由于政治斗争需要，伪造的材料相当多，辨别真伪要下很大功夫。又如，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的著作，至今虽相隔时间不算太长，但由于时代的不同，后人读起来已难全部弄清楚，这就使注释工作量相当可观。党史学界应该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如果党史学界没有人在这方面下功夫，如果党史研究工作者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不仅不可能使整个研究工作深入发展，而且连起码的研究也谈不上。当然并不是说，搞史料就要靠旧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使用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法，而是说应该吸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更加科学的党史史料理论体系。

第三，要弄清楚党史的研究与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关系。这个问题很复杂，整个史学界仍然在讨论。对此，党史研究工作者要采取积极研究的态度，特别应该鼓励那些有兴趣的青年进行探索。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封闭的体系，它要发展就必须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以丰富自身。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发展中总结出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如果能够被引进史学研究领域，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将会是有益的。当然，吸收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的可用部分，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并不等于二者相加，更不是代替。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一下，党史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的有用部分，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当我们研究建国初期的历史时，如果能够注意到社会心理变迁的研究，对于说明在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产生那么大的社会能量，是会有帮助的。

如果党史研究工作者能够积极进行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整个研究队伍都能以此武装起来，那么党史研究的面貌肯

定会大有改观。

四

作为历史科学，党史研究的领域应该是相当宽阔的。但是，党史学界普遍感觉研究领域狭窄。人们常常抱怨由于限制过多和档案开放不够，使研究者无题可选。这不能不说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党史的研究不受一定限制是不可能的，但既然只是限制而不是取消，那么就必然有不限制的部分。事实上，不限制的部分比被限制的部分要大得多。不知为什么有些研究者总想不开，偏偏要去研究被限制的部分，似乎只有这部分才有研究的价值。如果研究者能想开一点，把眼光移向不限制的部分，也许就会觉得研究领域不仅不那么狭窄，而是相当宽阔了。顺便说一句，有些限制研究的问题，如过去做的结论也未必完全对，与其让后人去评说，不如现在研究一下更有条件。话说回来，仅仅劝人们想开一点还不行。因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根本上有个怎样认识党史研究领域的问题。

说党史研究领域宽阔，并不是说它包罗万象。它只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既不能与通史等同，也不能与其他专史等同，而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无论如何拓宽，也不能“越位”。但是，如果认为党史只能从政治斗争史、政党斗争史、政党建设史角度研究，也是不对的。研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怎么能够不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思想的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着手呢？仅仅说明近代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就必须研究很多问题，诸如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思想的特征及其变迁、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作用、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迁、近代中国

社会意识的变迁，等等。党史研究领域宽阔，是由党的历史自身的内容决定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中，进行极其复杂的、尖锐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和建设事业，从任何单一的角度都无法做出如实的描述，更不可能做出科学的结论。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党史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内容是从经济上分析国民党转向抗日的原因。该生收集了大量国内外经济资料，经过分析、综合，做出切合实际的结论，使国民党转向抗日原因这样一个在现代史、革命史、中共党史、国民党史中都很重要的问题，得到更为科学的说明。这位研究生并不是转向搞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而是从经济方面去研究党史中的问题。今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王跃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一文，既不是单纯研究文化思想史，也不是单纯研究社会史，而是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的角度研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革命。可见，只要我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去研究党史，也就不会再感到研究领域狭窄了。

说实在的，现在不是没有问题可研究，而是要研究的问题太多，忙活不过来。尤其是要从一些新角度去研究，而管辖这些角度的专史已有成果之可用部分太少。譬如，要研究国民党怎样由抗日走向腐败，就需要借助于诸如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文化思想史、社会生活史、民国史、国民党史的成果，但实际上这些专史所能提供的材料却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好在目前许多专史的研究已经着手，我们的研究条件会逐步得到改善。

五

以上四个问题都是党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有待于大家逐步研究和讨论，取得满意的认识，促进学科的发展。最后，顺便谈一下与学科建设直接有关的研究者队伍的建设的问